



清末民初 江苏省教育会研究

谷秀青 著

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

谷秀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谷秀青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 - 7 - 5633 - 8984 - 1

I. 清… II. 谷… III. 教育-社会团体-研究-江苏省
IV. G5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981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组稿编辑: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650mm 1/16

印张:20 字数:26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序

彭南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兴起于清末的教育会,是与商会齐名的一种新式社团。在清政府看来,它是一个辅助官治的自治机构,“教育会、商会等,皆无非使人民各就地方聚谋公益,遇事受成于官,以上辅政治而下图辑和”^①,在清末新式教育与地方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江苏省教育会作为清末创办最早、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性教育社团,颇为引人注目。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教育会之类的社团组织远远不如对商会那样重视,虽然学者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分歧点还很多,尚须讨论的问题也不少。谷秀青博士在充分把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决定以江苏教育会为题展开研究,并在解读相关文献史料后,以社会权威性模式为观照点,以江苏省教育会是如何为建立这种社会权威性模式而参与一系列教育、政治、社会性活动为问题意识,逐层深入,形成为目前读者看到的论述框架,并在此架构下提出了一些具有启示性的结论。

作者从历史研究的传统路数出发,从江苏省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入手,分析了江苏省教育会产生的时空环境。在作者看来,清末民初,宁、苏二属由于相异的地理环境、各具特色的民情风俗,南北分野日趋显著,为避免“宁苏之争”,一个统一的江苏省教育会便呼之欲出了。在这样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新式社团中,虽然制度条文十分完善,但制度与行为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落差,传统乡缘、业缘、血缘以及同年之间关系的介入,使得许多制度条文失去了相应的法定约束力。不

^① 《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一期。

过,江苏省教育会存在于较为富庶的地方社会中,从未因经费缺乏而捉襟见肘,并因此获得了较大的活动能量。接下来,作者在社会权威模式构建的视野下,采取“小故事、大历史”的叙述方式,撷取一系列典型事件与案例,注重在抽象分析下进行细节描述,在精细化讲述中加以宏观解读,诸如清末民初江苏各地的毁学事件、教育会为实现教育经费的独立化与议会和商界之间进行的颇为持久的利益争夺、“胡仿兰事件”、波及全国的“存土案”、“模特儿事件”、易长风潮、反对教育厅长回避本籍案,不一而足。透过这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作者看到了江苏省教育会是如何一步步从教育走向社会,又如何从社会扩大到政治领域,最终被迫终结的历史命运,于是,作者按照历史的逻辑构建起一幅社会权威性模式塑造的图景。当然,作者运用的方法是否恰当,形成的观点是否正确,仍有待于学界的检验。

不过,作为谷秀青博士的业师,看到她的学位论文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经过修改后付梓面世,颇感欣慰,也为她在学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感到高兴。她跟随我先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达六年之久,是我学生中第一个硕、博连读的。本来,我不赞成自己指导的硕士生继续报考我的博士,常常劝说他(她)们改换门庭,甚至有意贬压学生的分数,因为在我看来,理论上的修养、方法上的训练,通过三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可完成,而一个真正的学者需要接受不同的风格的熏陶,博采众家之长,才能避免褊狭。好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一个和谐的研究氛围,对研究生也一向采取集体指导原则,在这个环境中,学生们既能听到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高屋建瓴的学术报告,也能得到严昌洪、罗福惠、马敏、朱英等知名学者的指导。因此,六年来,她从一个略具史学背景的本科生,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展开研究工作的博士,这既得益于她的勤奋、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一个研究集体。

学术贵在坚持,因为学术之路是漫长的,漫长的学术之路上又常常伴随着坎坷与曲折、清贫与寂寞,历史研究更是如此。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只有经过远航途中的大风大浪、暗潮汹涌,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谷秀青博士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愿她能在历史的教学与科研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并祝愿她取得更大的成就!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3
三、研究构想	13
四、江苏省教育会沿革谱系的考证	14
第一章 江苏省教育会的兴起	17
第一节 江苏的自然人文环境	17
第二节 “合群”观念下江苏省教育会的建立	33
第二章 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形态	47
第一节 教育会的治理结构	47
第二节 教育会的运行机制	67
第三章 教育活动与资源整合	87
第一节 兴学与毁学:教育会对于地方资源的博弈	87
第二节 教育会与江苏教育经费的独立化	99
第三节 从单级教授到职业教育:教育理念的现代转换	127

第四章 江苏省教育会的社会参与	139
第一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地方楔入——以“胡仿兰事件”为例	139
第二节 地方社团与国家政府的博弈	152
第三节 教育会与公众话语的建构	164
第五章 江苏省教育会的政治参与	211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江苏省教育会	212
第二节 江苏省教育会与江浙战争	227
第三节 教育会与国民党的疏离	246
结 语 江苏省教育会社会权威模式的塑造与终结	273
一、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	273
二、公众新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建立	281
三、江苏政局变动中教育会影响的强化与式微	286
征引文献与参考书目	289
附表一	299
后 记	306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清季以来,国势日衰,西方殖民势力日益深入,国内革命风潮不断,内忧外患,形势窘迫。在此情形下,各种救国思潮纷纷涌现,以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为主导倡建的各种学会、教育会等社团组织也异军突起。特别是教育会,不仅担当了教育救国之责,也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江苏省教育会即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中国近代教育会,根据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折》,其宗旨为“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应与学务公所及劝学所联络一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规定“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项,力图教育发达为目的”。其后虽屡有修订,但与初期所定章程大同小异,实出一辙。^①

国人最早创办的教育会为1902年的中国教育会,该团体主要由各地士绅联合组建成立,在“革命救国”的旗帜下呈现出鲜明的革命性。但随着其革命活动的频繁,清政府对其限制也日益明显,加之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矛盾,中国教育会最终于1907年宣告解散。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一部分籍贯江苏的中国教育会成员联合江苏其他士绅于1905年成立了江苏学会,后更名为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作为一地方社团,在清末各省的教育会中,是建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后来其他各省建立的教育会都或多或少对其有借

^① 1919年北京政府对教育会章程又有所修订,但与1912年的章程有所雷同,规定“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项,发展地方教育为目的”。

鉴模仿之处。因而同其他教育会相比,江苏省教育会更具有典范性的意义,且其自身文献保存相对集中,这也是本书把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清代的江苏,督抚不同城,两江总督驻南京,江苏巡抚驻苏州,且在南京、江苏分置两布政使,此种行政架构造成了江苏省“省份之名称一,而省会之地方二”^①。换言之,江苏省的行政管辖存在两重系统。具体到教育行政机构上,宁苏两属各设有学务处,分别为两江学务处与江苏学务处。二者因为管理职能的交叉模糊常常出现分歧抵牾,从而造成了很多管理层面的空隙。另外,清末行政机构对于地方事务的管辖常常局限于县级以上,对于更大范围乡村社会的控制多鞭长莫及。这就为江苏省教育会切入地方社会,分享地方教育事务的管理,提供了契机。面对教育会的侵权越界,教育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有时也会发出“警告”的讯号,但在清末民初“弱政府、强社会”的大环境下,更多时候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

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能积极地介入地方事务当中,也与其会员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初创时期的江苏省教育会会员,主要为宁苏二属的士绅,他们当中既有影响遍及全国的士绅名流,如张謇、唐文治等,也有地方的精英人物,如沈恩孚、俞子夷、凌文渊、张志鹤等。当然,随着时事的变迁,不同会员的社会影响也在发生变化,如张謇在民国之后影响力稍有下降,而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等人后来都在民初的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但不论如何,正因为吸纳了众多地方精英与社会名流,江苏省教育会才可以借助、集合这些会员的个体能量,参与到地方教育事务当中,行使某些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

除了参与地方教育外,江苏省教育会对于政治、社会等领域也频频涉足。这固然与中央政权的式微有关,也与清末以来倡导的地方自治思潮密不可分。地方自治,是清季士绅和民众对于中央政权认同危机下的一种反映。在此指导下,江苏省教育会通过塑造江苏乃至全国

^① 《覆两江学务处论总学会应设上海书》,沈同芳编:《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上),1906年,第11页。

范围内的新式学界、构建新的公众话语体系和价值观、提倡苏人治苏等,试图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模式,渐进地改造民众,改造社会。这在民初混乱的政治格局下,对于地方社会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性。因此,通过对江苏省教育会诸多参与活动和塑造这种权威模式过程的研究,正可分析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下社会与国家间一张一弛的关系。

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适,也伴有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对立。江苏省教育会作为清末以新学姿态面世的教育社团,在引进外国教育方法、实现教育理念转换方面,走在了国人教育改革的前列。如前期提倡的单级教授法到后期倡导的“道尔顿制”,从培养宪政人才到职业技术人才的转变,以及平民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提倡,这些对于当代教育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正是在一系列新式教育的提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新学的教育。但也存在着对于新学排斥的群体,如那些固守传统教育思想的旧式士绅即属此类,而双方对于新学态度的差异,除了思想层面的矛盾外,还夹杂有学界的派系纷争与原有权益的再分配,这在教育会内部也有明显折射。当然,新旧两派除了对立博弈之外,两者也存在共同的利益牵连。于是在近代过渡时代的背景下,新学人为利益诉求有时也会屈从于传统,自愿与传统士绅为伍,此点也与社会转型时期新旧力量消长对比的阶段性的有关。这也是江苏省教育会自始至终正副会长皆由拥有旧学背景的人担任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江苏省教育会这种掺杂着新旧双方阵营人物的社团,似乎更能够体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和复杂性,这也是本书有意着墨之所在。

正因上述因由,本书选择了江苏省教育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分析江苏省教育会的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活动参与以及这些活动背后复杂的人事关系,来揭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与国家之间调适的可能,以及调适过程中的复杂性。

二、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虽说距江苏省教育会在中国的设立已有百余年,但对其研究却是

近几十年的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辛亥革命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以绅商为主体的商会研究蓬勃发展,作为商会研究的外围组织,教育会的研究也随之开展。

1. 1980—1990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对清末民初教育会的研究可谓一片空白。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领域的拓宽,特别是辛亥革命史的繁荣、商会史研究的兴起,清末民初的教育会才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较早开展近代教育会研究的应属国外学人,如巴斯蒂(M. Bastid Bruguere)和任以都^①。二者皆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涉及教育会的论文。巴斯蒂主要考察了江苏教育总会在清末实业教育的兴起中所起到的作用。任以都则界定了清末教育会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大多数学堂、文学馆、报馆、教育会、通俗报等等在作革命的宣传……主张排满革命,建立新社会,已成为一个广大潮流了”。因此可以说,清末民初教育会研究的启动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化密切相关。但国外研究的触及,并未能马上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在此阶段,国内主要集中在史料整理方面,1981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舒新城编辑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稍后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也面世了。这两套资料都包含有清末民初教育会的相关史料,为后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不少便利。另外,俞子夷的相关回忆对教育会也有所涉及,也可作为史料看待。^②

2. 90 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等广泛运用,研究方法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此阶段,关于清末民初教育会研究的成果在论著、文章方面都有涉及,特别是关于教育会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无论数量和质量,均有较大进展。

首先,史料整理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朱有璩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该丛书以学制变化为主线,时间从 1862 年同文馆的

① [法]巴斯蒂:《从辛亥革命前后实业教育的发展看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的作用》;[美]任以都:《辛亥革命时代国内教育界的动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641—2659 页。

② 俞子夷:《一九二七年前几个教育团体——回忆简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 年第 2 期。

成立到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收录了大量学部时期的上谕、奏折以及教育会和各地办学情形的资料,其取材范围从一般文献扩展到报刊杂志、地方志、文集和年鉴等,为近代教育会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由璩鑫圭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则以专题为经,年代为纬,收录了大量的文集、年谱、日记等,该丛书形成许多专题,分门别类进行论述,单独辑册。其中由朱有璩等编辑的《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更集中收集了清末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团体等资料,不仅较前述史料整理有所完备,更为清末民初教育会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正是在上述史料整理与出版的基础上,加之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元化,清末民初教育会的研究日益深入。

其次,研究成果方面,既有专著问世,也有专文涌现。就专著而言,此一阶段,不仅有专门论述教育会的著作出现,且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张伟平的《教育会社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教育会社的内涵、缘起、运作及其影响,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教育会社内部体制的变化沿革,对于教育会社的外围空间所涉不多,整体缺乏一种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此外,马敏、朱英、桑兵、熊贤君、关晓红、刘正伟、阎广芬等相关专著章节中也有所提及。^① 论文方面,教育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分析上,如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中央教育会以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② 特别是对江苏省教育会的研究,并于2006年教育学专业方面呈现出两篇颇有深度的博士论文,即郑新华的《近代中国教育如何可能——以江苏省教育会的实践为例

①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桑兵:《清末新知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熊贤君:《中国教育行政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阎广芬:《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日]高田幸男著,甘慧杰译,承载校:《清末地方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的形成——苏、浙、皖三省各厅、州、县教育行政机构的状况》,《史林》1996年第3期;刘正伟、薛玉琴:《江苏省教育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2000年第9期;关晓红:《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张彬:《经亨颐与浙江教育会——兼论民国初年浙江教育近代化的推进》,《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李露:《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对民初教育立法的影响》,《学术论坛》2000年第3期。

(1905—1927)》和孙光勇的《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郑新华着重从江苏省教育会的历史活动中,集中考察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为代表的三个实践向度,以事件考察的形式,描述了教育社团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时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进一步为实现近代中国教育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形式。此篇论文以理论见长,思辨严密,但叙事略嫌简单。孙光勇则从社会变迁的角度,通过对基督教教育会和中国教育会在清末至1922年间的比较研究,梳理出新式教育的发展脉络,以及新式教育界的形成过程,而在深度方面,尚有可供进一步补充之处。

就学界现有教育会的研究内容而言,主要以以下几个议题展开:

1. 教育会的性质

教育会研究作为社团研究的一个分支,关于其性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官方、半官方和民间性的争执上。

童富永通过对中国教育会成立的时间、人员构成、组织机构、宗旨及中国教育会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考察,认为中国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团体。关晓红在对中央教育会与地方教育会的缘起、作用等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央教育会“基本是官方组织,是学部决策的咨询机构”。各地教育会则由“民间自发组织改变为半官方团体,成为政府教育行政机构体系的辅助机构”。贺金林通过对清末先后出现的三种类型的教育团体比较研究,得出与关相似之结论。^①刘登秀则认为,教育会是一种由教育界和与教育界有关的民间各界人士组织的法人社团,虽然其与官方有较多联系,并受官方的制约,但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半官方团体”,不过刘认同中央教育会是官方组织的说法。

上述主要是对教育会性质的总体概述,关于地方教育会性质的具体考察主要有:白锦表通过分析浙江教育会及其与教育现代化的关

^①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443、442页。贺金林:《清末教育团体类型之比较》,《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6卷。

系,指出浙江教育会是一个涵盖全省的民间教育团体,不具有官方性。王佩良也认为,江苏教育总会虽具有辅助地方教育机构之功能,仍为一民间教育团体。^①刘正伟将江苏教育总会界定为“资产阶级立宪派为核心建立的教育社团”。

综观上述关于教育会性质的界定,争论核心在于教育会与政府之关系。达成一致之处为,中国教育会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中央教育会基本上为官方组织,地方教育会在半官方和民间团体的定性上依然存在分歧。

根据虞和平对“社团”的界定,社团“是一种认同关系,又具有某种共同目的或利益的一群人自愿组成;它具有明确的成员界定,拥有众多的成员;有比较完整的组织协调体系和特定的社会整合功能”。^②虽然教育会在章程、组织、功能等方面与社团范畴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制度条文与常情变态之间往往存在明显差别,判断教育会的性质是以纲常条文为准,抑或以教育会具体实践的功能为准绳,此为教育会定性之关键。

2. 教育会与政府的关系

这一问题其实是上一议题的延伸。教育会与官方关系的疏密成为判断其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因而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成为应有之义。早期教育会的研究主要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史研究的一部分,教育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与政府之间处于对立状态。如童富永、巴斯蒂、任以都的考察,其倾向性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教育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依赖多于冲突斗争,正是双方在众多领域的合作,才使得国家、地方社会秩序得以稳定。朱英在考察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演变的轨迹时指出,“民间社团建立后更多

①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第331页。刘登秀:《清末教育会研究》,四川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2004年;白锦表:《浙江教育会与浙江教育现代化》,《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王佩良:《江苏辛亥革命研究》,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博士论文,2004年。

② 虞和平:《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的不是以政府对立物出现,而是以相互协作式的互动为主;从性质上看近代中国的某些民间社团已初具市民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①金顺明也认为教育团体作为一种以从事教育活动为核心的功能性社团,与政府之间仍以协调为主。^②另外,邱秀香对清末江苏教育总会的成立、发展过程及其与地方教育行政、中央教育会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清朝中央政府对民间自发性团体力图控制的愿望,双方在斗争与合作当中呈现的一些显著特点。^③刘登秀在考察清末教育会的学务、政治活动后,进一步指出,教育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绅权力量的强弱休戚相关,利益的砝码成为平衡双方关系的纽带。^④

3. 教育会与劝学所的关系

根据1906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厅州县须择一公所设立劝学所,总汇全境学务,由地方官监督。即劝学所必须“辅佐县知事,办理县教育行政事宜,并综核各自治区教育事务”。^⑤也就是说,劝学所为办理教育事务的地方行政机构,这与以社团身份办理教育的教育会在职能方面有很多的重叠性,因而,双方在执行职能时,其关系既有合作,也有摩擦。

高田幸男通过对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考察分析指出,二者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其合作的表现:一、劝学所与教育会合驻于同一幢建筑物内;二、教育会因经费不足而从劝学所那里接受财政援助;三、一些劝学所的总董由教育会选举产生。冲突主要表现为教育会越俎代庖行使劝学所的行政职能。^⑥张艳丽考察了直隶新政督学机构和兴

① 朱英:《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② 金顺明:《近代中国教育团体的发展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③ 邱秀香:《清末江苏教育会之研究》,胡春惠、周惠民主编:《两岸三地“研究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研讨会论文集》,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0年。

④ 刘登秀:《清末教育会研究》,四川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2004年。

⑤ 张壬:《地方教育行政》,世界书局,1933年,第4页。

⑥ [日]高田幸男:《清末地方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的形成——苏、浙、皖三省各厅、州、县教育行政机构的状况》,《史林》1996年第3期。

学措施,指出劝学所和教育会皆为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补充,在清末兴学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①刘登秀也认为,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总体来说,教育会是一种由民间士绅组织的教育社团,主要起辅助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作用。劝学所是由政府拨款并委派人员组成的官方机构,是地方教育行政的组成部分。教育会与劝学所的这种监督、咨询、联结关系,共同促进了本地学务与新式教育的发展。但是,二者的关系,各地表现不一。如川沙、宝山等地,教育会会员势力强大,劝学所许多职能由教育会代替。另外,学界对于二者的研究,时间大多界定在清末,对于民国时期由劝学所改组而成的教育局与教育会的关系关注不多,这些都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4. 教育会之间的关系

1905年江苏学会成立以后,各省相继模仿成立各级教育会。教育会的分布,也从省级、县级,延伸到乡级。各级教育会之间关系如何,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本省乃至国家教育、政治发展的瓶颈。另外,教育会内部派别的关系,对于各级教育会之间的关系也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构成了教育会诸多关系的重要一环。

桑兵指出,中国教育会作为近代中国教育会的雏形,其内部激进派、温和派两派人员的矛盾复杂性,致使其在1907年瓦解。温和派的人员后来大多流入江苏学会,激进派组成了军国民教育会和爱国学会。刘正伟通过考察江苏省教育会与地方教育会之间的关系,指出江苏省教育会与各县级教育会之间虽然无隶属关系,但江苏省教育会在为地方教育会提供组织借鉴、权力整合和渗透方面有重要影响。^②张彬在概括浙江教育会成立的背景以及经亨颐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分析了以经亨颐为首组建的浙江教育会的功能,如召开全省教育会联合会,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特别是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合作与交流促

^① 张艳丽:《清末直隶新政中的督学机构与兴学措施》,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论文,2002年。

^②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第341—344页。

进了浙江教育会的发展;^①而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召开,也打破了省界的壁垒,学界由互不来往渐趋联系频繁。李露进而指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是五四前后颇有权威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学术团体,其历届年会的议决案曾对民初的教育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②刘登秀对上述各种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教育会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省级教育会与地方教育会之间互不统属而又互相渗透的关系,也包括省级教育会之间互相联合、借鉴的关系。

上述作者考察了教育会内部派别的纷争,以及省级教育会与县级教育会、其他省级教育会之间互不统属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为教育会勾勒出一副错综复杂的网络。

5. 教育会的活动

教育会作为辅助教育行政机构的教育社团,其活动参与广泛,如学务活动,一方面包括教学方法的引进与改善。如彭泽平等考察了江苏教育总会于1909年从日本引进单级教授法后在中国的推行及实施情况。作者认为此教学方法以实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为特征,适应了清末普及教育的需求,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独立自主能力,也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师资力量。^③刘正伟分析了江苏省教育会倡导的职业教育、通俗教育、国语教育、理科教育和体育教育等在推进江苏省教育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④他还和薛玉琴一起考察了由江苏省教育会人员所组织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指出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江苏省教育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二者人员的交叉融合,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状态。^⑤上述研究成果,大多强调教学方法在

① 张彬:《经亨颐与浙江教育会——兼论民国初年浙江教育近代化的推进》,《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② 李露:《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对民初教育立法的影响》,《学术论坛》2000年第3期。

③ 彭泽平、吴洪成:《近代中国单级教学实验探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④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第352—375页。

⑤ 刘正伟、薛玉琴:《江苏省教育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2000年第9期。